

[文章编号] 1005-1597 (2008) 05-0063-05

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中农民的思想变迁

徐建国

[摘要] 抗战时期, 晋冀鲁豫边区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 对根据地农民进行了经济上的动员, 提高了农民的经济地位, 进而改变了农村阶级状况。同时, 通过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极大地动摇了农民传统的封建思想观念, 形成了经济、政治上的动员和社会变革的整体互动, 促进了农民的新民主主义思想观念的产生和增强, 主要表现在阶级意识、团结和组织意识、斗争意识、政权观念和参政意识、民族国家观念、政策法规意识等六个方面。减租减息运动中农民思想观念的变迁, 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 抗战时期; 晋冀鲁豫边区; 减租减息; 农民; 思想变迁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关于减租减息运动的研究, 目前学界主要限于运动的开展、过程、经验等方面。本文拟从农民思想观念变迁这一视角对这次运动进行研究, 从而探讨经济政策和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 揭示中共发动和组织农民的社会根源。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1942 年以前是宣传阶段, 军事斗争是当时的主要任务; 1942 年减租减息运动开始在部分地区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展开,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群众的积极性初步调动起来, 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为 1944 年运动的广泛深入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1944 年开始, 减租减息运动在全区广泛开展起来, 成为普遍深入的群众运动。

减租减息运动“绝不是过去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 以为政府下道命令, 或群众团体召开个大会就可以把民生工作处理完, 广大群众的生活真正得到了改善”。根据地农民生活于封闭半封闭的乡村社会中, 固守着世代相袭的传统思想观念。绝大多数农民认为: “那块地该交多少租是老规矩, 说减就减, 有点亏心”, “富贵贫贱由命定, 减了的也发不了财,

不减的也不一定就吃亏”。所以, 要真正使党的政策贯彻落实下去, 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观念在群众中生根发芽, 就要改变农民传统的思想观念, 以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观念来取代农民固有的传统观念, 这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纵观农民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思想观念的变化,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阶级意识的产生和增强

在减租减息运动开展前, 农民的头脑中是没有阶级这个概念的。由于封建社会十分漫长, 传统思想观念在农民头脑中根深蒂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封建统治是一个完整的東西, 不但有其经济基础, 而且有其上层建筑, 即农民在思想上、道德上、习惯上, 都在封建束缚之下, 认为地主的封建统治是当然

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四), 档案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508 页。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 土地问题》,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25 页。

的、合理的。”这导致农民只有穷富观念，缺乏明确的阶级意识，而且“把贫富贵贱都看作是‘命运’决定，不能由人”，甚至在绝大多数农民看来，不但不应该仇恨地主，反而应该感谢地主：“地是人家地主的，人家不租给咱地，咱怎么能活呢？”

如何改变农民的命运观念？这是运动开展的关键一步。群众的发动，“离不开农民的思想觉悟，当群众还没有认为减租是必要的和正当的时候，他便不会积极的行动起来”。如何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呢？“这就须要从根本上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也就是说要找到打破农民命运观的切入点。单纯用讲大道理或行政命令的方法，是不可能得到农民的赞同和认可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从农民的贫富观念出发，引导农民“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行反省。‘穷人是怎样穷了的？地主是怎样富了的？地主是怎样压迫咱们的？’围绕着这些问题，群众便会从自己生动的历史事实中，找到‘穷根子’”，使农民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他们并不是天生命穷，而是由于地主阶级的剥削才导致贫穷，农民有了剥削和被剥削的意识觉醒，才能树立明确的阶级观念。通过“访痛苦”、“倒肚子”、“诉痛苦”等形式的引导，“特别是经过最受剥削最受痛苦的群众的反省，群众的阶级觉悟便会大大提高，和地主之间的阶级界限便会明显的划分开”。

对于从事双减的干部来说，则存在如何引导的问题。“要教育所有干部以群众的话解答群众问题，使农民认识剥削关系与剥削实质，尽量揭露地主阶级的凶恶，对农民的欺压狡诈，暴露其伪善面目，打破农民‘良心下不去’的旧观念，启发其阶级意识，明确阶级对立。”这个过程可以简化为，从农民朴素的贫穷观念出发，诱导农民思考：自己为什么穷？是因为被剥削穷的。地主为什么富？是因为剥削别人富的。从而使农民产生剥削和被剥削的意识，在此基础上，引导农民明确剥削者就是地主，被剥削者就是贫雇农，从而确立明确的阶级观

念。阶级观念的产生，使农村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弱化了农民的家族认同，消解了宗族与宗族、村与村之间的矛盾，为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二、团结和组织意识的增强

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和分散性，使农民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处于涣散状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在农民具有的初步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启发农民的阶级意识，明确阶级对立关系。只有阶级关系在农民意识中明确起来，才能有真正的社会统一战线”。农民有了阶级认同感和归属感，才能引导他们团结起来。因此，要引导农民“从租佃关系上认识地主老财一般黑，天下穷人是一家”。为了动员广大农民团结起来，很多地方提出了“组织起来有力量”的口号。为了加强运动中的阶级团结教育，有些地方提出了“农民是一家人”、“一条

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二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690页。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二辑，第690页。

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441页。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第440页。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第202页。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第441页。

山西大学晋冀鲁豫边区史研究组：《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第二辑，1980年内部参考印行，第259页。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第206页。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第206页。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第202页。

心，干到底”、“大家都是穷朋友”等口号。通过家的观念的延伸和扩大，把广大农民团结到被剥削阶级这个阵营里来。

针对运动中出现的农民之间互相倾轧的现象，太行区平顺县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老根是地主”这样通俗易懂的口号让群众知道“地主通过你来剥削我”的道理，消除了农民之间的对立情绪，稳定了阶级阵营。

农民有了阶级认同感和阶级归属感，还需要有一个组织起到组织和协调的作用，把涣散的农民力量整合起来。农会在整合农民力量方面具有自身的优势。“农会不同于政权，更不是政权的附属，而是农民自己的组织，不是站在农民上面或外面向群众要求，而是站在群众中间领导群众。”所以要切实把农民组织起来，形成有组织的斗争，“首先是应把农会壮大与健全起来，动员一切农民加入农会，使农会等群众组织具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成为整合农民力量的中心。如沙河县在运动中，由农会组织农民开展运动，取得很大的成绩，并且使农民“真正认清了农会是为自己谋利的群众组织，在‘要抗日吃饭，组织农会自己干’的口号下，纷纷成立或改进村农会……以前对农会表示怀疑或观望的农民，均已正式加入”。

通过实际的群众斗争，让农民得到利益，更易于推动农民团结和组织意识的增强。“从斗争中组织农民，组织农民力量，让农民群众了解，只有自己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1943年1月，太行区涉县由农会组织召开了斗争本县头号地主聚五的万人大会后，广大农民认识到加入组织的重要性，“全县农会会员猛增到18300多人，青教会、妇教会会员增加到7500多人”。

三、斗争意识的产生和增强

农民有了阶级意识和团结观念，需要通过斗争这种具体的形式加以巩固和加强，并且使农民在斗争中得到实际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阶级意识和团结观念。但由于多年来一直受

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农民对地主怀有强烈的恐惧心理，不敢或不愿意直接与地主开展面对面的斗争。“被地主压迫很多年的佃户，是不敢出头减租的”，“经我们鼓动后，他们虽然认为是应该的、合理的，但还不愿意自己出头”。采用集体斗争的方式是改变这种状况的重要方法之一，在集体斗争中激发农民的斗争意识，“从气势上形成农民斗争的政治优势”。

太行区涉县于1942年11月3、13日和24日连续在南岗召集了联村斗争大会，有数千人参加，当场就把旧债文书烧毁，农民收回了被押的土地。1943年1月17日又在井店召开了斗争大地主任聚五的万人斗争大会，有20名受害者诉苦，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阶级观念和斗争意识，群众的精神面貌大变，各项工作都随之活跃，全县的减租减息运动就在这段时间内普遍开展起来。在1942年的减租减息运动中，太行区左权县麻田镇在斗争地主贵和诚时，也是在群众组织起来，集体登门辩理后才算账退租的，“当场退出钱2700元，粮食30

参见《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第445、439页。

参见《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第446页。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第12页。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七：群众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198页。

《新华日报》（华北版）1942年8月11日。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第208页。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1937—1949）》，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第438页。

《雪峰回忆录——太行十年》（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参见《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第13页。

石”。

四、参政意识、政权观念的产生和增强

经过减租减息运动，广大农民的参政意识和政权观念显著增强。在运动中，中共强调引导农民的民主政权观念。“在佃户面前，着重解释：现在的八路军不和别的军队一样，抗日民主政权，也不和老政权一样，他们不是相富人，不相穷人，现在不是官（相官），民相民”，使广大农民认识到抗日民主政权是代表穷人利益的政权。

农民在运动中得到的实际利益促使其进一步增强对政权的信任感，积极投身到参政议政中来，其参政意识和政权观念不断增强。1941年的村政权普选中，冀南广宗县刘湾头村在登记选民时，把村民刘得喜漏掉了，于是他找到筹备村选的负责人，要求参加选举。太行区1942年的“减租减息运动促进了村政权的改造，那些同地主富农有勾结、领导斗争不力的村干部，都被群众改选掉了”。林县清沙村在运动中罢免了不为群众谋利益，私用公款的农会正副主席，群众的情绪开始有了新的转变。

太行区在1944年冬季的县选中，“证明人民对选举是非常认真的，有些人因得不到公民权痛哭。武乡、左权有些村庄，参加选举选民达公民总数75%以上，榆社全县参加选民达公民的73%。”羊角村的一位佃农说：“现在民主好了，咱算出了一口气。”赞皇县石路村在选举前一天，一个叫郭宝银的妇女对人说：“明天选举是一件大事，咱们都要早起，别误了。”在1944年的减租减息运动中，太行区平顺县路家口村佃户秦德顺说：“地主告我，干部问你时你要说租已经减了，你要防备以后种不上地。现在我懂了，这不能怨干部，由政府作主，就要真减，不能假减。”这些事例说明人民对政府信任度的增强，也说明农民参政意识和政权观念的增强。

五、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生和增强

在封闭的传统社会中，农民缺乏民族国家观念。中国共产党从中日民族矛盾的角度来引

导农民，交租交息是因为在中日民族矛盾占主要地位的形势下，“争取地主、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政权方面，而不跑到敌人与顽固派方面去”。如果不交租交息，把地主阶级推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立面，就会增加敌人的力量，削弱自己的力量。

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教育干部人民在执行法令中，注意克服与防止各种偏向，在某些地区注意调整各阶层间存在的协调的现象”。“对已经执行了法令的每个公民，保障其人权、政权、财权、地权，坚决贯彻减租减息法令，其已减者，必须依法交租交息，借粮须还粮。”要使民族国家观念成为群众的自觉意识，还需要“再引导群众根据抗战的环境去讨论，即本来不该交租，但是因为要抗战，地主投靠了敌人对大家不利，所以应该交一些租，换取地主和我们一道抗日”。“各地都强调进行法令、政策教育，引导群众了解共产党政策的全部内容和精神实质，使农民从切身体会中，认识减租减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第14页。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二辑，第611页。

参见山西大学晋冀鲁豫边区史研究组：《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第一辑，1980年内部参考印行，第296页。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1937—1949），第169页。

参见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三），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505页。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六：财政经济建设》（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299页。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第25页。

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第二辑，第9页。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第77页。

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第二辑，第259页。

地政策，目的是团结各阶层参加抗日斗争。”

在成为自觉意识的基础上，农民才能够从国家民族的大局出发来考虑问题。黎城县在1944年的双减运动中，由于地主在减租之后生活发生困难，于是召开了农民地主联席会，农民在道理上、法令上说服了地主，然后自动地向地主作了适当让步，酌量减少了减租的数量，照顾了地主的生活。

六、政策法规意识的增强

在传统社会中，农民遵守的是乡规民约这些不成文的规定，信奉的是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缺乏政策法规意识，即使是经过宣传，农民一般也是采取漠然的态度。“由于佃户对法令不了解，如对减租办法不懂，已减租的还不知道是怎样减的，有的根本不知道种地还要按照法令订约交租。”所以，造成工作不能顺利开展的主要教训之一是“在广大群众中缺乏法令的解释教育”。

如何增强农民的政策法令意识，使他们自觉地用政策法规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只有使农民掌握了政策法规，才能够把政策法规贯彻下去，要“重点宣讲减租减息是抗日民主政府的法令，进行减租减息是合理合法的”。我们发动群众就是为了把政策法规贯彻下去，发动农民掌握政策法规并作为自己斗争的武器，和地主进行斗争。所以政策法规本身就是发动群众的，同时也只有正确地执行政策法令才能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政策法规意识的增强，是个不断强化的过程，“先要在舆论上作动员，如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请士绅开会，在座谈会上要求他们表示对减租减息的意见，经过小学教师进行宣传等”。

经过动员，群众初步觉悟起来，就迫切要求实际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群众尚不完全了解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要求也往往有超越法令范围，所以对行动起来的群众”，更要进一步加强政策法规教育，使群众的行动能够约束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最有效的办法是开展说理斗争。由于知识水平和社会见识等方面的差异，处于政治劣势

地位的地主往往在说理斗争中占有优势，迫使农民自觉加强了对政策法规的学习。“每一个大会几乎都有激烈的争辩，反映了农民、地主都在运用中央的土地政策，为自己的利益寻找法律政策依据。”通过辩论的形式来学习政策法规的效果，比单纯的宣传要好得多。通过对政策法规的深入了解，“有不少贫苦农民敢于站出来诉苦，与地主开展面对面的说理斗争，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减租减息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从经济的角度对根据地农民进行政治动员的过程。这是党在经济和政治动员相结合的基础上结出的硕果。经济和政治动员推动了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反过来，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共经济和政治动员的进行。减租减息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广大农民的思想变迁，促进了传统乡土社会农民思想观念的重构，加速了乡村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农民由传统思想观念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观念转变，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作者徐建国，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福建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宿凌)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1937—1949)，第226页。

参见《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第269—270页。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三)，第655—656页。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六：财政经济建设》(上)，第287页。

《李雪峰回忆录——太行十年》(上)，第133页。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二辑，第660、625页。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第269页。

《李雪峰回忆录——太行十年》(上)，第142页。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第17—18页。